

《我们的故事：77&78》正式发行

《我们的故事：77&78》一书收录了25位77-78级同学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的记述了文革前“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中断十年的具体原因。比如如何葆庵在“我们姊妹的求学路”一文里写道：“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轰轰烈烈地席卷全国……文革前高考都是每年7月1日开始进行，随着日期一天天的临近，我们越来越纳闷，怎么还不见丝毫动静？消息终于来了，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推迟高考半年，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在显著位置分别刊登北京四中 and 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抛出‘要做社会主义工农兵，不做资产阶级大学生’的论调（68页）。”有的片段叙说了以文革为顶端的历次政治运动给无数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些灾难的积累可以说是文革结束和恢复高考的民意基础。比如董丰在她的文章里讲到文革中她在工厂当工人时的一个故事：“一天，办公室里只有陈师傅和我。他给我讲了文革中他随装甲兵学院搬迁到甘肃酒泉沙漠地带的经历。院校在清理营盘时，推土机推出无数千尸。后来知道那里原来是右派劳改农场。三年大饥荒时很多右派在那里饿死了，就草草埋在黄沙漠里。陈师傅平静地叙述了一个遥远的故事，但是我的心被狠狠戳打着，痛着，再沉下去蒙上一层死灰。多年后夹边沟的事情被写成了书。我不知道陈师傅去的地方是不是夹边沟。文革乱世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公，但到底我们还活着。我感到活着就有希望（45页）。”有的片段则见证了解放后直至2005年对全体国人施行的“政审”制度的可怕。比如严聪这位“上中学时对数学有种偏爱，只要有点难度的题，我就上瘾”的77级学生虽然对文化考试有绝对的自信，对自己是否能过“政审”却捏了一把汗：“当然我有软肋，不一定能上得了大学，那就是政审。想考试得先报名……填就填吧，反正得过这一关。我拧开笔帽，众目睽睽下硬着头皮填好表，上面除了我是工人，其他都是剥削阶级。为了这些和我并不相干甚至没见过面的剥削阶级们，文革中我受尽了人间歧视，遍尝苦涩。现在文革刚结束，不知套在脖子上的这根绞索能不能松开（262-263页）？”同样，陈全在他的故事里写道：“77年的高考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77年高考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审查。我后来了解到，住在浙江大学同一层宿舍楼里面的一百六十几个78级的男同学中间，竟然有三十来个人在77年因为政治审查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八个人中间就有三个人在1977年政审不及格。……77年高考结束后，报纸上揭露出了大量类似的案例，因此，1978年中央彻底改变了政治审查的方法，明确规定政审结论必须和考生见面，并让考生签字后才能有效。……78年严格执行了这样的招生和政审政策，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无数人的个人命运的改变累积成了国家命运的改变，而国家命运的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命运的改变（14-15页）。”王辉云的漫漫求学之路着实让人心情沉重。他先于1977年报考研究生因政审被拒之门外，后因政审77、78两次高考无果，最后通过自己奔波为自己平反，又有幸得到北京二外曾因“苏联间谍案”在秦城蹲监七年的李越然先生的惺惺相惜才于1978年底破天荒地在反革命帽子未摘的情况下插班成为大学生。……



在本报及印州众位77&78同学的长达一年之久的精心筹备和计划下，《我们的故事：77&78》终于正式发行。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购买本书：
Amazon.com;
aatodayin@gmail.com (如自取可免邮费)
有问题请电：317-213-5825

按照当年的规定，73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一律在进入大学课程学习之前，增加半年的文化补习学习。因此我们到77年才大学毕业，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了。我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届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来自西北大区招生的钱老师向我透露了73年招生的一些秘密。事实上在“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发生之前，太白林业局的招生录取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原定的是录取文化考核成绩的前五名，只等政治审查批准完成后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事件发生后，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和高压，西北大区全部高校招生人员集中到兰州，学习了两个礼拜。钱老师他们当时很担心我家庭出身不好，有按分数高录取的嫌疑而通不过。从兰州回来后，为了表示本次录取工作没有按分数录取，大家商量后就为太白林业局调配了两个名额，结果录取了七人。广州农林学院录取了文化考核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录取了文化考核的第二名和倒数第二名。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正是73年的文化考核和钱老师们的努力和智慧为我挂起了人生的云帆，从此一路顺风，远航五大洲三大洋。

2017年底举家从英国迁至美国印第安纳州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在州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一个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的同学聚会。2018年3月3日，陪同身为77级的太太参加了聚会。一共有来自47所大学的81位老同学与会。主持人要求每个77、78级的老同学用一分钟的时间简述一下四十年前听到恢复高考的通知时自己正在干什么，谁是一生中最感激的人等等。邓小平是大家公认的最应该感激的人。望着一张张不再年轻的面孔，听着每个与会者特殊的经历和感人的故事，我的记忆闸门突然打开，尘封了四十年的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我是73级工农兵大学生，同样是邓小平路线的受益者。那年招生由于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一改过去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原则，加上了文化考核这一条。这一考核可吓退了不少不学无术的后门者。那时候招生的一个原则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我当时在陕西省太白林业局的秦岭深山当伐木工，林业局自然是林学院的主要生源啦。招生名额是按系统和隶属关系分配。太白林业局隶属于陕西省森林工业局，分配到了五个名额，分别是：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广州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和西安医学院。各个隶属林场和单位推荐后，按一比三的比率，确定了十五人参加文化考试。开考后才发现有二个“后门生”没来参加考试，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其中一位是副局长的千金。1974年招生取消文化考核后，她也进了和我同一所学院。）参加考试的十三人全都是老三届下乡知青，被招到林业局当采伐工和筑路工的。我凭着当年在北京人大附中初中六六级的文化功底，在太白林业局文化考试中名列第二（第一名是一位高六六的西安知青）。尽管后来有来自白卷英雄的干扰，不过我还是有幸被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录取，得以进入木材机械加工专业学习。

按照当年的规定，73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一律在进入大学课程学习之前，增加半年的文化补习学习。因此我们到77年才大学毕业，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了。我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届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来自西北大区招生的钱老师向我透露了73年招生的一些秘密。事实上在“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发生之前，太白林业局的招生录取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原定的是录取文化考核成绩的前五名，只等政治审查批准完成后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事件发生后，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和高压，西北大区全部高校招生人员集中到兰州，学习了两个礼拜。钱老师他们当时很担心我家庭出身不好，有按分数高录取的嫌疑而通不过。从兰州回来后，为了表示本次录取工作没有按分数录取，大家商量后就为太白林业局调配了两个名额，结果录取了七人。广州农林学院录取了文化考核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录取了文化考核的第二名和倒数第二名。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正是73年的文化考核和钱老师们的努力和智慧为我挂起了人生的云帆，从此一路顺风，远航五大洲三大洋。

四十年前我不是77年高考的考生，而是“考官”，是这次高考的参与者，特别的经历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由于时间紧迫，77年考试分别由各省组织，各地高教系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作为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我被选中参加了江苏省高考工作组，到南通专区协助高考组织工作。我们学校派了四位老

师参加省高考工作组，其中三位级别颇高：谢俭风老师是学院人事处的处长，三八式老革命；另外两位是林工系办公室主任姜文浩老师和南下干部、林学系办公室主任元亦芝老师。我们和南京工学院的几位老师组成南通专区高考工作组。南工的老师是由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带队。

在77年发布高考通知后，不久又发了恢复高校研究生招生的考试通知，这一消息大大鼓舞了我。我开始准备迎接新的挑战，报考研究生。实话说，对于参加高考工作组，我觉得会影响自己的研究生考试复习，并不十分情愿。我只能在高考工作组的繁忙工作中见缝插针地做高数习题。

当年江苏考生众多，不得不在十一月搞了一次初试，淘汰了二十多万人。正式考试是12月23和24日。我记得我们是12月初从南京坐船到达南通市的，住在南通地区招待所。经过几天学习后，我和姜老师以及南京河运学校河运专业党支部书记郑亦秋老师，还有南工的小钱老师（也是刚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被分到如皋县，姜老师任组长。我们住在县委刚刚落成还未开张的招待所。如皋县委很重视高考，也曾来看望，不过从未宴请招待。江北的冬天阴冷潮湿，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加上招待所是新房子，特别潮湿，实在不舒服。当时物质供应极差，食堂伙食也很糟糕，我们还要和三干会的农村干部一起“抢饭”。由于我们常下基层，无法按时就餐，县里后来专门为我们开了小灶。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两位年长老师热情高涨，除了安排的工作，还要接待上访考生，做些政策性的解释工作。我们年轻教师的主要工作是跑基层考场，去查看高考的准备工作。我原打算去不远的黄桥镇瞻仰当年新四军的军部，品尝著名的黄桥烧饼，但由于工作紧张，竟一直未能成行，可谓抱憾终身。

如皋是一马平川，和我过去插队的陕西农村和工作的太白林场在地势上截然不同，然而在当时，交通仍然困难。我们要去下面学校查看考场的准备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汇报解决。几十里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带人的自行车，司机就是蹬车人，乘客坐在后面的架子上。自行车在苏北平原纤细的田埂上飞奔，开始时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我不得不惊叹骑手们的高超骑技，有几次过尺把宽的独木桥，我吓得想下车走过去，结果都是骑车带人，稳稳当当地过去了。

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我们四个人聚在院子里抽签，决定谁去哪个学校检查，并查封考场。外面请好了四辆“自行车的”。我抽到去姜埕中学，当下由招生组付清“的士”费就出发啦。姜埕中学就在丁堰镇上，与苏州和无锡隔江相望。对这个古镇我印象最深的是商业街上石板铺地，旁边是两排整齐的木板门面的商铺。对我这个在上海出生、北京长大、陕西插队伐木的北方人来说，有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脑海里至今还留着当年古镇的画面。

记得姜埕中学至少有六栋古朴的青砖平房，无疑是个很有历史的学校。我和学校领导一起检查了所有的高考教室，然后贴上封条。第二天天不亮就又一次坐“自行车的”去姜埕中学考场监考。我们撕开教室的封条，核对考生准考证，让考生入座。令人难忘的是考生的组成，高高矮矮，老老少少，什么样的都有。有的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饱经风霜三十好几的青壮年，也有满脸天真蹦蹦跳跳打闹闹的十六七岁应届生，这

些都是初试遴选出来的佼佼者。整个考场悄然无息，纪律井然。由于省高教局高考工作组的身和工作需要，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我可以在六个考场自由进出监考。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开始觉得有些得意，自幼当学生至今十多年，总是在被考试，而今天一身轻松，在当“监考官”。接下来感到的是忐忑不安，因为不久以后我也和他们一样，要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我们实际上是“同病相怜”。还有一个场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上午考完后，我吃完午饭路过学校门口，看见一排考生“可怜巴巴”地蹲在墙边，等待下午的考试。他们在寒风里缩着头，抄着手，也不知是否吃了午饭，可是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燃烧着希望的火光。

考试结束后试卷被封好，由我坐一辆北京吉普把考卷押送至阅卷中心。阅卷中心设在如皋师范的两座教学楼里，一座用于阅卷，一座用于住宿。我们和阅卷老师一起住在教室里，睡铁架子床上下铺。尽管我们是高考工作组，一样无权进入阅卷楼。阅卷的老师一水都是四十开外的中年骨干教师。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阅卷老师们总是在交流一天改卷的见闻。大家最高兴的是批改到好成绩的卷子，这个兴奋地说“我又看到一个小胡子，那解题步骤清清楚楚，一看就知道是文革前受过正规教育的”；那个激动地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满分，一定又是那个小胡子”。他们把老三届当时已年近三十的考生统称为“小胡子”。那种喜形于色、由衷高兴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我想他们当中一定有不少老师在改卷中，从解题思路、作文的风格甚至笔迹认出了自己当年的好学生。在历经十年文革的磨难后，年轻人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啦！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他们为国家和个人美好光明的未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乐！在阅卷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他们欢快的情绪包围着，十分开心！

今天回想起来，尽管77年高考是由各省组织且时间紧迫，但各项程序都是严格执行有条不紊的，表现出各级领导的重视和行政能力；而且整个过程未见请客送礼，完全没有



朱光锐和妻子蒋本瑜在2018年3月3日印州77&78级同学庆祝高考恢复40周年聚会上。

走后门的现象。看来77年高考完全沿用了文革前严格的高考程序，有效地杜绝了作弊的发生，真正做到了公平竞争，是举国上下认可的实践。高考工作组的工作前后进行了大概有一个多月，这次特殊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恢复高考是如何深入人心。它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年轻人的希望，从此社会上尊重知识，热爱学习蔚然成风。

这一切也激励着我发奋学习，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在监考的时候我就设想过自己重新坐在考场的情景。一年多后，我真的坐在西安交大402教室，参加79年研究生考试，如愿以偿成为西安交大摩擦学研究所的研究生。那时我才真正相信：靠自己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接下来就更幸运啦。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三年后去英国求学，三年后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又做了三年博士后。博士后毕业一直在工业界工作，曾供职德国、英国、瑞典和美国的大公司，也一直在英国、德国、美国以及中国从事研发工作至今。从2011年到2017年，公司外派我去中国的研发中心工作了六年。我有幸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很高兴自己参与了这场变革，这一切和77年高考是无法分割的。我庆幸自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受益者。